
守 望

夜已阑，望星空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星座里，群星闪耀，我们找到了守望者E. P. 汤普森，也找到了守望者刘大年……



西方史家素描 ——从希罗多德到海登·怀特

夕阳西下，推窗远眺，湛蓝的天幕上，浮云与落霞交映，晚风与暮靄相伴。此情此景，令我立刻想起黑格尔的妙喻：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。

密涅瓦的猫头鹰呵，请你慢些起飞；在这黄昏时刻，愿我的思绪追随着你，去捕捉那一掠而过的西方史家的影像，从一些凌乱而又失诸零碎的材料中，或论史家风格之独特，或叙史家求真之坚韧，或讲史家才情之非凡，或说史家学识之精深，在“多面的历史”的描述中，寻觅他们的学识与才情，坚韧与精深。

希罗多德

公元前5世纪，某日，奥林匹亚。

这是一个初夏的日子，晴空万里，气候炎热，不过从爱奥尼

亚海不时吹来的阵阵海风，多少带来了一丝凉意，而下雨则是当地居民的无限期盼。

只见一座残丘土坡上，簇拥的人群，围着希罗多德（前484—前425），在听他高声朗读《历史》的片段：

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，他总是拥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。拥有最多的东西，把他们保持到临终的那一天，然后又安乐死去的人，只有那样的人，国王啊，我看才能给他加上幸福的头衔。

听者无不为之动容，其中一位少年更是为希罗多德的传世之作所激奋，涕泪满面而不能自制。希罗多德见状，对这位少年的父亲说：“你的儿子深受求知欲的感动。”

这部《历史》就是希罗多德的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著作，内容宏富，奠定了西方史学的根基，也奠定了社会文化史的范型，并被罗马人西塞罗称之为“史学之父”，这一桂冠一直传至今日。

修昔底德

上文中说到的那位少年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古希腊历史学家的杰出代表修昔底德（约前460—约前395），作为晚辈，修昔底德并没有沿着希罗多德的脚印亦步亦趋，而是另辟蹊径，开创了为后世西方史学奉为正宗的政治军事史范型。

修昔底德原先在雅典城邦从政，公元前424年，他被雅典公民推选为炙手可热的十将军成员之一。但是，也正是在这一年，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是年冬，斯巴达将领伯拉西达率两个远征军团，在色雷斯盟军的协助下，向雅典在色雷斯的重镇安菲波里斯发动进攻，该城危在旦夕，修昔底德奉命率七艘战船支援，但兵至城破。安菲波里斯之失陷，在于守将攸克里的过失，其责不在修昔底德。然而，雅典执政当局指控他贻误战机，且有通敌之嫌疑，乃加罪于他，被判放逐在外20年。

然而，“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”。在这蒙受不白之冤的漫长岁月中，他忍辱负重，潜心撰史，为写不朽之作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付出了他全部的心血，终于成就了他作为古希腊最卓越的历史学家之大业。逆境催人奋进，锲而不舍，永不言败，这位古希腊先贤的事例可为之佐证。

波里比阿

公元前218年9月，阿尔卑斯山麓。是时，山上已开始落雪，常年积雪的山路更是崎岖难行了。

然而，山脚下却集结着一支大军，浩浩荡荡，气势不凡，史载那是一支由古代著名军事统帅迦太基人汉尼拔率领的部队，计有步兵9万，骑兵1.2万，战象37头。

此行何为？

这是迦太基人与罗马人为争夺西部地中海霸权、持续百年的布匿战争中的第二次大战，史称“第二次布匿战争”。

此行何方？

直指罗马。其行军路线是这样的：汉尼拔从西班牙新迦太基城出发，经法国南部，兵至阿尔卑斯山，翻山越岭，直奔北意波河，最后攻打罗马。

汉尼拔素有“战略之父”之美称，他制订这个军事行程，打算给罗马人意外一击，置之于死地。但眼下要把这支队伍带出阿尔卑斯山，实在是困难重重。汉尼拔原想找寻当年高卢人越过此山时的通道，但未果。他只好率众另行登山开道，在山中足足走了15天，吃尽苦头，损失惨重。当大军到达北意波河平原时，只剩下2万步兵，6 000骑兵了。

然而，罗马闻讯，举国震惊，便匆忙派兵阻击，首战告负；次年再战，又败于中意特拉西美诺湖，罗马城告急；又一年，汉尼拔与罗马人在南意坎尼决战，他用兵有道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“坎尼之战”案例。

.....

大约又过了六十多年，灰飞烟灭，战火已熄。在阿尔卑斯山脚下，走来一位希腊人，他大约五十上下，满头乱发，一脸胡茬，但行动敏捷，意欲登山。这个人就是希腊化时代的大史家波里比阿（前201—前120）。他此行也是为了翻越阿尔卑斯山，沿当年汉尼拔的进军路线，重新行走。

波里比阿翻越阿尔卑斯山，着实令我们感动：

在上古西方，由于文字记载出现较晚，文献资料颇为匮乏，为此史家撰史，多赖实地探访，希罗多德是这样，修昔底德是这样，波里比阿也是这样。

要写出信史不易。波里比阿写作《通史》，对第一手史料的搜集是煞费苦心的，因为他有这样的观念：求真，乃史家之第一要务。为此，他毅然翻越阿尔卑斯山，重走汉尼拔的行军道。

现代史家效法者不乏其人。不是吗？后人研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曾多次沿着他当年的航线重行；又，后人研究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扶桑，曾多次沿着他当年的走向重航……

倘问，这为的是什？答曰：求真。从这里，我们看到了史家为写信史而矢志不渝与坚韧不拔的精神，一种中西皆然的史学传统。

恺撒

外国“太史公”？没听说过。

告诉你吧，他是恺撒。

没有搞错吧，你说的是那个叱咤风云的罗马政治家、军事统帅同时又与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有情感纠葛的恺撒吗？

正是他。不过恺撒还有另一面，他还是古罗马共和时代的第一流史家。

愿闻其详。

只说一点好吗？你也许读过大仲马的著名小说《基度山伯爵》，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：

深夜，在罗马郊外的圣·西伯斯坦陵墓中，强盗头子罗杰·范巴借着暗淡的油灯微光，津津有味地读着一本书，他读得是那样的聚精会神，以至于当有人进来时，竟没有听到脚步声，并又特地声称，这本书是他最爱读的。

罗杰·范巴读的那本书就是《高卢战记》，它的作者正是恺撒（约前100—前44）。

盗首在陵墓中夜读《高卢战记》的情节，富有浪漫与诗意，这当然是作家大仲马的一个虚构。但这种虚构，却包含了历史真实的客观基础，显示了史学的巨大魅力，也反映了恺撒的“多面”——他的史才。

恺撒善叙事。他叙事冷静而不失客观；他行文巧妙，匠心独运；他不崇雕琢，质朴自然。无怪乎在当今西方学校仍用作教材，作为拉丁文的范文来读。他同时代的文学家西塞罗曾作过这样的评价：“在历史著作中，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，比这种一清如水、简明扼要的文笔更令人悦目赏心了。”

“善叙事，有良史之才。”在我国古代，把善叙事与良史是连在一起的。因此，我们称恺撒为“良史”，也是名副其实的，进而言之，称其为外国“太史公”亦无不可。

既然如此，那么赶紧去找《高卢战记》来读一读吧。

圣·奥古斯丁

基督教的产生及其从一个地区性的教派发展为世界性的一神

教，对人类文明所发生的巨大影响，恐怕无论怎样评价都是不会过分的。

就它对史学的影响而言，也是如此，由圣·奥古斯丁（354—430）所奠定的神学史观可否说明？

圣·奥古斯丁，生活于古典世界行将崩溃的公元四五世纪之交，其中半是邪恶，半是善良；半是对旧世界的回忆，半是对新世界的憧憬；半是哀怨，半是希望；半是对地上之城的无情批判，半是对上帝之城的讴歌颂扬；半是黑暗，半是光明；半是过去总结的补白，半是向往未来的宣言；半是……

这个新与旧、世俗与宗教、黑暗与光明交替之际的人物，既是时代的产物，又从某个侧面反映了这位从异教皈依基督的教徒的心路历程。在企图以上帝的意旨教化世人之前，他已完成了自身的心灵净化。他的思想本质不是“半”而是“一”，即：新战胜旧，光明战胜黑暗，简言之，上帝之城战胜地上之城，四海归主，人类一体。就这样，人类历史在圣·奥古斯丁的笔下被诠释为一种直线运动，一种由固定的起点（上帝创世）到终点（末日审判）的直线运动，最后归向为一个“永恒王国”，阿门！

我们透过圣·奥古斯丁“半是”表象的描述，其实可以发现他的史学观念与古典史学迥异的一种本质特征。倘如是，也就能理解论者云，基督教史学的产生导致历史学发生了“一场革命”的“名言”。

马基雅维里

1972年，记者招待会。

美国国务卿亨利·基辛格纵谈他的政治哲学之后，与记者有一段问答。

问：你说你对美国总统有影响，对此我们不感兴趣。

答：那你对什么感兴趣？

问：人们感兴趣的是，你是否是一个信奉马基雅维里（1469—1527）思想的政治家？

答：不，完全不是！

问：那你在多大程度上，受过马基雅维里的影响？

答：一点也没有！

亨利·基辛格的回答令人寻思。现在，我们的问题是：

为什么这位大名鼎鼎的政治家要对马基雅维里讳莫如深呢？

为什么莎士比亚要称那位意大利人为“凶残的马基雅维里”？

为什么爱德蒙·柏克要称法国革命的“民主暴政”的基础是“邪恶的马基雅维里政策准则”？

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猛烈抨击马基雅维里政策，称这种政策的真正代表者是那些在革命转变阶段企图“扼杀民主力量”的人？

为什么当代美国学者利奥·施特劳斯迄今还坚持称马基雅维

里学说为“恶魔之说”？

简言之，马基雅维里与马基雅维里主义可以等同吗？马基雅维里能对后世那臭名昭著、坏人心术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负责吗？

应当如何正确看待与评价马基雅维里？

“这位伟人的名字使任何墓志铭都显得徒费言辞。”马基雅维里墓上的这句碑文，也许能让我们体悟出这位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、历史学家的真正的一面。

伏尔泰

1757年，瑞士，洛桑。

时年63岁的伏尔泰（1694—1778），为躲避法国专制政府的迫害，四处奔波，在此暂居，英国青年才俊爱德华·吉本闻讯，慕名拜访。

伏尔泰一见到吉本，立即张开了双臂，热情地拥抱了这位英国青年。吉本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这位长者：卷曲的头发，修剪得十分整齐，衬托着他的面容，凸显其广博和睿智；线条分明的嘴角，显示了他的雄辩才能；微微凹陷的双眼，却是那样有力，似乎可以看透他人内心深处的一切奥秘；尤其是那件玫瑰色的外衣，一直垂到膝盖以下，显得那样潇洒，使人不由觉得他真是那个时代“理性之光”的化身，以至于他的教诲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

伏尔泰虽已过花甲之年，却精力充沛，处处勃发出青春般的活力。他对吉本说完一件不久前发生的宗教迫害事件，严词抨击了天主教：“什么教皇、主教、神甫，他们尽是一些文明的恶

棍，如同两足禽兽……”

吉本非常佩服伏尔泰向腐朽的宗教势力进行挑战的大无畏精神：“您对宗教暴行和教会罪恶的批判真是入木三分啊！”听到青年的赞美，他显得很兴奋，在客厅里踱着方步，并转移了话题，对吉本讲起了他的《路易十四时代》。

“您这部书的宗旨是什么呢？”吉本问道。

伏尔泰谈笑风生，兴味盎然：

本书拟叙述的，不仅是路易十四的一生，作者提出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。我企图进行尝试，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，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。

好一个“要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”，吉本心里这样想着，只听得伏尔泰又继续说道：“在这部历史中，我将只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，能描绘人类天才和风尚，能起教育作用，能劝人热爱道德、文化技艺和祖国的事件。”

作为历史学家的伏尔泰，他的史学业绩确为18世纪理性主义奠定基础，并为近代西方史学最后开启了大门。

吉 本

1764年10月15日，古罗马遗址，卡皮托尔废墟。

黄昏，从卡皮托尔山冈远眺：夕阳西下，夜幕悄然降临，朱庇特神庙的赤脚托钵僧唱着晚祷歌，放目临风，纵览古今，令人遐想不已。

一位年轻人——爱德华·吉本（1737—1794），是时27岁，正是风华正茂的岁月。眼前的景象引动着青年吉本无穷的思绪：昔日罗马帝国的繁华已烟消云散，当年鏖战的沙场也早已成了英雄们的丧身之地，恺撒安在？奥古斯都又安在？俱往矣！曾经沧海，星移斗转，浪淘千古，谁主沉浮？

此刻，这位年轻人豪情满怀，浮想联翩，撰写这个被称作“永恒之城”罗马衰亡史的念头立刻涌上了他的心田。

触景生情，由情而发，名著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历吉本20年之辛劳，终成矣。

毋庸置疑，这一灵感成就了吉本史学。不过有一点尚需补白，那种成就某位史家的灵感是不可多得的，它如同电光一闪，只是对智者眼睛的偶尔显露，吉本，也只有吉本，才能超越常人的眼光，不失时机地将它捕捉住，并与他思想撞击而产生思想火花，这就是灵感的魅力。

历史学家需要真实，难道要疏远灵感吗？难道在真实与灵感或求真与想象之间，进言之，在科学与艺术或历史与文学之间，没有某种相互交融与相互联系的本质属性上的共同点吗？

基 佐

因译注吉本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而一举成名，在西方史学

史上可谓不乏其人，法国政治家兼历史学家基佐（1787—1874）可为显例。

基佐有志于学术，又热衷于政治，这一两面性贯穿其一生：他因译注上书出名，很快地被聘为巴黎大学近代史教授，这时他才二十出头；但他不甘寂寞，很快地从教室走向社会，积极从政，谋求官位而有所得；33岁那年，他从政坛上跌落，重返巴黎大学执教鞭，于是就有了人们所熟知的《欧洲文明史》《法国文明史》等传世名作，并由此确立了他的世界性历史学家的地位；1830年法国“七月革命”的浪潮，又把他推向了政治舞台的前沿，位居内阁首相。从政后的基佐并没有失掉历史学家本性的“一面”，他在此时创立了法国历史学会，组织史家共同编纂与出版大型的《法兰西史料汇编》，为史学的发展做了不少实事；1848年“二月革命”的风暴再次把他赶下了台，下野后的基佐又重新全力潜心于历史研究，虽则在晚年还有过一两次短暂且告失败的政治冲动，这也始终反映了基佐本性的“另一面”。

由上所述，可知基佐一生是在从学—从政—从学—从政—从学的循环中度过的。基佐两栖型的生活，反映了史家的“多面性”，学术脉动与官场争胜，著述旨趣的“名山事业”与宦海角逐的神经末梢，杂糅而又相分，矛盾而又相容，统一在这个两栖型的人的身上。

政治家的基佐如风云变幻的近代法国历史舞台上来去匆匆的过客，但历史学家的基佐却为后世留下了足印，留下了一个“天才历史学家”的名声。

兰 克

午夜。

大地沉睡，月色朦胧。在这静谧的夜里，一位老人还在工作，不过他的工作方式很奇特，不是伏案写作，而是坐着口授，由助手记录成文。

“继续念下去，那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应当完全抄下来。”老人说。

晚风拂过窗户，掠过摇曳的烛光，恰好映在他的脸上，照见那花白而又稀疏的头发。这是兰克（1795—1886）晚年工作情景的素描。此时，他年过八旬，已不能阅读，也不能书写了。他是靠这种方式继续写作。

“那本书在里层靠窗口的那一格书架上。”兰克叫助手到他的藏书室内去查找，总不忘唠叨：“请不要随便移动我的书，也不要根据大小把它们放在一起。”

助手又继续给他念材料。“不要这些，它不是重要的。”老人突然插话。

兰克著作等身，他的全集有五十四卷之多，其中还不包括他用这种口授的方式写作的《世界史》。

编写一部多卷本的《世界史》，是他八十二岁高龄时提出来的，尽管他当时已不能读也不能写了，但他说，不写作他无法活下去。他悟到，“上帝”给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于是便像一个年轻人一样，发疯地工作着。他的工作日程表是这样的：上午9点起床，

早饭后，由一个助手协助，从9点半一直工作到下午2点，下午4点用餐，睡1小时，再与另一助手合作，从下午7点持续工作到午夜12点。

老人站在窗前，喃喃自语：“历史学家是在上帝的轨道上进行工作的。”助手不解地望着他。

老人又继续说道：“我已与上帝签约了，他必须再给我五六年时间，以便完成这部著作。到那时，我可以高高兴兴地去见他了。”

他就这样不断地“写”着，并快乐地活着。

兰克逝世前，他口授的《世界史》已出七卷。后来，他的门生杜费把他的有关讲稿与之联成一体编辑出版，成为九卷本的《世界史》问世。不过在此要顺便说一下，兰克的代表作不是这九卷本的《世界史》而是《教皇史》，那是他刚过不惑之年时的杰作。

兰克死了，享年九十一岁。

人毕竟是要死的，但对长寿者兰克来说还是很幸运的，因为“上帝”非但没有违“约”，反而多给了他三年阳寿。

布罗代尔

1937年11月。大海，蓝天，一艘大型客轮正劈波斩浪，行驶在浩瀚的大西洋上。在甲板上，时年三十五岁的布罗代尔正出神地望着这翻腾的海浪。“历史不就是那深不可测的海洋吗？历史

不就是阳光永远照射不到其底部的沉默之海吗？那喧嚣的当前历史时刻，不就是海洋中所激起的那一闪的波涛吗？”他半是自语，半是沉思。

历史的巧合，注定布罗代尔与年鉴学派确有缘分。是年，他在巴西圣保罗大学完成执教三年的任务后，归国途中竟与吕西安·费弗尔不期而遇同乘一条船。当时，还没有开通横越大西洋的飞机航班，在长达三周的海上旅途中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自此他成了年鉴学派的一员，并在日后成为年鉴学派最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，是为“布罗代尔时代”。

人们评议说：“如果设立诺贝尔史学奖，布罗代尔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人选。”说得好。他的《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》（简称《地中海》）可以为之提供最有力的证据。在这里，我们实在有必要说一说这部鸿篇巨制成书当中的“细节”：在“二战”中，他沦为一名战俘，在德军战俘营的五年中，他完全凭着个人非凡的记忆力，娴熟地运用史料，开始了《地中海》一书的写作，至1945年获释时，他已完成了该书的大部分初稿，1947年定稿，1949年出版，迅即引起学界的轰动，被公认为一部世界级的史学名著。

其实，布罗代尔为我们贡献的不只是一部鸿著，更重要的是为世人传达了一种总体史的史学理念，一种播扬世界的年鉴学派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论，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而言，人们把《地中海》作为一部具有里程碑式的名著，那是实至名归的。